

美国《1930年关税法》的出台及其恶劣影响

□ 罗振兴



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严重破坏全球贸易秩序并引发世界贸易大战的关税法。该法正式名称为《1930年关税法》，以其主要发起人——时任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里德·斯姆特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利斯·霍利的名字命名。该法是美国国会最后一项实际设定关税税率的立法，将数千种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

为保护美国农产品市场而出台

一战后美国经济出现短暂的衰退，但是在20世纪初经历“咆哮的20年代”后，美国经济整体表现不错，出现了科技进步、工业扩张、消费高涨等向好景象，股市也持续高涨。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却增产不增收，生产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美国国内农业保护主义诉求日渐高涨。

19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竞选美国总统时，为了拉选票，承诺通过加征关税来保护农产品市场，开启了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共和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后，旋即准备兑现大选承诺。1929年1月7日至2月27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开始一系列修订关税的听证会，启动了立法进程，相关法案于1929年5月28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被提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则在1930年3月4日通过了该法案的修订版本，最终两院会议版本于1930年6月13日、14日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并在6月17日由总

统胡佛签署成法。《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前后出台长达18个月，是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关税立法。

对美国 经济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从法案主要内容来看，《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重点是对农产品和部分工业品提高关税，是美国历史上应税进口产品关税第二高的法律。在当时美国通货紧缩背景下，该法生效后，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关税在1931年和1932年分别达到53.2%和59.1%，仅低于1828年关税法》在1830年达到61.7%的最高水平。同时，该法在1922年《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的基础上提高了美国进口的平均关税。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使关税大幅提高，与其他因素共同导致美国进口量大幅下降。在1929年至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下降了40%。进口降幅远高于同期实际GDP 25%的降幅。结果，进口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4.2%下降到1932年的2.3%，应税进口占GDP的比重从1.4%下降到0.7%。这一时期，导致美国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约占4—5个百分点；1929年至1933年通货紧缩导致的关税上调，约占8—10个百分点；1929年至1932年实际GDP的下降，约占25—28个百分点。由上可见，《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致使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进口量下降因素的比重中占据10%—13%，毫无疑问是美国进口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更为严重的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加剧了大萧条，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1929年峰谷到1933年的低谷，美国实际GDP下降了25%；失业率从1929年的4%上升到1933年的23%；1929年8月至1933年3月，工业产值下降了55%；通货紧缩尤其严重，批发价

格指数下跌了37%，农产品价格暴跌了64%。尽管经济史学家大多认为货币和金融因素是美国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一项严重的政策失误，显著加剧了大萧条的程度，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总的来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使美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在大萧条中越陷越深。

同时，该法严重影响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降低了投资和消费的信心。这从法案签署时股市大跌的反应就能看出：1930年6月16日，胡佛宣布打算签署该关税法案的当天，股市下跌了14个点，第二天总统正式签署时，股市又下跌了1个点。正如曾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所指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并非大萧条的根源，但它导致了世界贸易的暴跌，无疑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

使全球贸易秩序遭到根本性破坏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被称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引发了各国的贸易报复，世界贸易大战由此展开。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球至少有34个国家向美国表示严重关切，一些国家对美国违反了相关条约义务提出了正式抗议。同时，各国也开始了贸易报复，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贸易战就此打响。《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后的两年内，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迅速跟进，英属印度、秘鲁、阿根廷、巴西、中国、立陶宛等国也宣布普遍增加关税，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高额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加快蔓延，导致1929—1932年全球关税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1929年至1934年间国际贸易额由此下降了65%，美国的出口从1929年的52.4亿美元下降到1931年的24.2亿美元和1932年的16.1亿美元。美国在主要贸

易伙伴的市场份额下降，其中，1929年到1932年，美国在加拿大的市场份额从69%下降到54%，在英国的市场份额从16%下降到11%。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全球贸易秩序带来了破坏性极强的不良影响。它不仅破坏了最惠国待遇这一基本原则，重创了全球贸易秩序，还引发了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尽管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英国并没有就该法提出正式抗议，但在1931年11月，英国也不得不出台实施《非常进口税法》，对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进口税法案，规定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从价税，同时还与其领地、自治殖民地间实行互惠关税，即所谓的帝国特惠制，从而构成对其他国家货物的歧视。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的广泛报复和歧视，严重破坏了当时已经普遍实施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使得歧视性原则抬头，德国等国对外贸易极度萎缩，走上了封闭的、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的道路，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外，该法导致各国竞争性货币贬值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严厉的金融管制接踵而至，英国等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国际金融秩序也随之进行大变革。最终，正如当时1028位经济学家在呼吁不要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信中所指出的，“关税战不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这也是倒行逆施的该法对全球贸易战最严峻的警示。

面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并开始调整其贸易政策。1934年，为了减少美国与他国的贸易摩擦，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互惠性，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并由总统罗斯福签署生效，赋予总统通过双边谈判降低关税的权力，逐步取消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高关税政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主任）

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地区的交流源远流长。古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很早就从中国大陆出发，乘船沿中南半岛南行，到达了今天的马来半岛地区，乃至更远的印度。同样的情形，居住在今天的马来半岛的居民，也有很早乘船到达中国的记录。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与马来半岛相关的，是《汉书·地理志》中有关南海交通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一些海路可到达的地方，包括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等，许多学者认为其中的都元国便位于今天的马来半岛上。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王朝与南海的国家往来频繁。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出常骏等人，出使赤土等国。赤土国的位置便在今天的马来半岛中部一带。

不过，在南海海路上来往的，除了外交使节和商人外，还有一类人，那就是搭乘商船到印度求法的佛教僧人。他们的活动，是古代中国与这一地区友好交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来半岛为例，历史上到过马来半岛的中国人中，最著名的是唐代僧人义净。

义净本姓张，字文明，生于唐贞观九年（635年），出生地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义净幼年出家，正式成为僧人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印度求法取经。

唐咸亨二年（671年）十一月，义净从广州出发，乘坐波斯商船，20天后到达了位于今天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的室利佛逝国。义净在此停留了半年，学习梵语，然后搭乘“王舶”，沿海岸西行，到达今天苏门答腊岛东岸的末罗瑜国。他在末罗瑜停留了两个月，重新上船，转向北行，就到达了马来半岛西岸一个被他称作“羯荼”的国家。

各方面的证据都表明，义净所说的羯荼国即古吉打王国，就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吉打”是今名，“羯荼”是古名。羯荼是义净西行求法途经的一个重要国家。

义净在羯荼停留了大约四个月，然后在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继续乘坐“王舶”，向西北方航行，途经“裸人国”即今天的尼科巴群岛，最后在咸亨四年（673年）二月八日到达了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这是当时东印度最重要的一处海港所在地。

义净在印度求法，停留了12年。唐垂拱元年（685年）冬天，他离开印度返回中国。返回的途中，他第二次在羯荼停留时间约九个月。

离开羯荼后，义净再次回到室利佛逝。他在室利佛逝停留了六年，最后在唐长寿二年（693年）回到广州。证圣元年（695年）夏，义净最后回到了洛阳。从此在洛阳和长安两地翻译佛经和弘传佛教，直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在长安去世。

义净一生，除翻译了一百余部佛经外，还撰写过几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书对于今天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交往的历史，还有佛教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因此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广泛引用和研究。从19世纪后期至今，两部书在欧洲、日本和印度多次被翻译为法文、英文和日文出版。中国也先后于1988年和199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两部著作。

义净访问过的羯荼国，地属今天的马来西亚。如上文所述，义净曾先后两次访问羯荼，第一次是在去印度的途中，具体时间是在唐咸亨三年（672年）九月初到十二月中下旬，停留了大约四个月。第二次是在从印度返回的途中，具体时间是唐垂拱二年（686年）春初至十月，停留了大约九个月。

两次停留时间加在一起，有13个月或13个月多一点。在义净印度求法全部的行程中，这个时间并不算短。他在羯荼停留这么久，不仅仅是因为要等候季风，还有更多的原因。

第一，当时的羯荼，不仅地处海路要道，是今天的马来半岛西岸的一个重要交通港口，而且自身经济也比较繁荣。各种人员南来北往，都在此停留。其中有商人，也有求法的佛教僧人。

第二，当时的羯荼，有活跃的对外贸易活动，在羯荼停留的有一般的商船，也有“王舶”。所谓“王舶”，其实也是商船，只是不属

中马两国千年友好的历史见证

□ 王邦维

于商人，而属于国王。国王也从事贸易，说明海上的贸易获利甚丰。

第三，佛教在当时的羯荼很有影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在此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因此义净和其他中国求法僧人一般都会在这里做较长时间的停留。这也彰显了唐代中马两国以僧人求法为载体的友好交往。

最近几十年在马来西亚吉打州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古吉打州布央谷（Bujang Valley）的发现，有港口的遗址，有各种民居的遗址，有大量的佛像和佛教的文物，还有中国来的陶器和瓷器的碎片，都印证了义净法师选择在羯荼停留的原因。

除了义净访问过羯荼，姓名和籍贯可考的中国僧人还有：荆州的法振、乘如和乘悟，荆州江陵的无行，洛阳的智弘。其中法振不幸去世在羯荼。他们与义净同时到过羯荼，义净因此把他们的名字和经历记录了下来。义净之后，或者是义净不知道的，到过羯荼的中国人应该还有，只是没有留下名字。

对于羯荼，义净的两部书中虽然没有更多专门的记载，但他在讲到南海即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时，也讲到了当地居民生活中的很多情况。其中涉及古代羯荼的部分，是今天有关马来西亚吉打州最早的文字记载。今天讲吉打州历史和考古的书籍和文章，几乎没有一种不提到义净及其著作。

除了羯荼，义净还提到一个名叫“郎迦戍”的国家。郎迦戍在其他书里也被称作“狼牙修”。义净提到中国的僧人义朗、义辉以及道琳都曾经过到这里。郎迦戍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国家，位置大致在马来半岛的中北部。这也与今天的马来西亚有关。

1000多年前义净以及其他中国僧人的求法经历充分说明，历史上中国与古代马来半岛的居民曾经有过很多友好的交往。作为历史上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交往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义净法师和他西行求法的壮举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赞扬。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意大利汉学家马达罗：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见证者和讲述者

□ 谢明光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1942—2023年）是一位意大利汉学家，也是一名记者、作家、策展人。马达罗生前200多次来华，不仅去过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也走过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偏远地区，足迹遍及整个中国，被誉为“当代的马可·波罗”。结合在华丰富经历，马达罗致力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研究，积极传播真实的当代中国，著有《马达罗看中国》《见证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等著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和讲述者。

理解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1976年4月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2023年12月逝世，马达罗在中国的200多次旅行让他目睹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古老的中国在经历辉煌、苦难、衰落和革命之后，再次走向伟大复兴。在他的著作中，马达罗始终以欣赏和共情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此，他从来都是不吝赞美，“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又加强了社会和谐稳定”。

马达罗认为集体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成功秘诀之一。在考察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之后，他发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以纪律和奉献精神为基础，始终坚持“共同利益”的概念。集体主义是中国自古就有的重要思想和精神境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这种思想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崭新形态出现，通过“个人自由的小让步，换来了集体需求的大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深圳、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景象，更是证实了这种思想的活力。

对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一成就，马达罗不断提醒他的欧洲读者，“我们不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让我们牢记，中国人民有一个共识，他们认为，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切付出都是非常必要的。爱国主义，让中华民族取得了站起来的胜利”。

在马达罗的笔下，真实的中国不仅仅存在于古老的历史之中，更是存在于当代中国。他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伟大变革、取得了伟大成就。而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一种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创的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它的建立，保障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让中国真正迈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马达罗表达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这一制度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努力的结果，其本质是以“中国式”的方式发展中国。而这一制度不断巩固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它将“意识形态和社会试验积累的力量全部释放了出来”，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在经济领域，这种精神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中国人的

创造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马达罗还指出，不同于西方与苏联，中国从未来将“社会主义精神”输出到其他地方，而是本着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甚至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携手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历史到现实，马达罗透过中国的巨变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必然发生的历史逻辑。正因如此，马达罗批评了西方人的一些错误认识。在他看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吹毛求疵，“实质上背离了西方的民主概念”，中国不需要走与西方完全一样的道路，有权利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制度。

纠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

马达罗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纠正了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对中国毫无根据的错误臆想——一个“异物”，一个封闭的无法被理解的世界。也正是他的“见证”，向西方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正如意大利世界中国出版社总编辑莱娅·文德拉梅尔所说，马达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放弃了西方的偏见，设身处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去观察这个国家”。这也是马达罗汉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让真正的史实说话，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马达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他没有止步于严谨的汉学研究和真实的新闻报道，而是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地将一个真实的

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真实的窗口。

为了消除东西方之间的认知赤字，也为了让意大利人近距离了解中国，马达罗多次通过实物展览的方式，让意大利人重新了解中国、客观认识中国。他在意大利举办过各种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展览，诸如“丝绸之路和中华文明展”“紫禁城的秘密——利玛窦在明朝”“满洲末代皇帝”“成吉思汗与蒙古人的珍宝”“西藏，世界屋脊上的宝藏展”等。

特别是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在他的家乡特雷维索举行的“西藏，世界屋脊上的宝藏展”上，马达罗利用他所收集的自1700年以来在欧美和亚洲出版的200余幅不同的世界地图，向西方社会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地图由不同国家绘制而成，包括法国、英国、美国、荷兰在内，都将西藏标注在中国版图内，成为西藏属于中国的最好例证。

马达罗对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俗，以及在经历了众多苦难之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充满共情和敬意的。通过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透过文字、镜头，马达罗搭建起一座理解中西文化的桥梁，让西方以更为丰富客观的视角感知日新月异的中国。

